

卡莱斯基与凯恩斯： 独立找到近乎相同答案的两位经济学家^{*}

杨 扬^{**}

【摘 要】在 20 世纪 30 年代,当大萧条来临时,卡莱斯基和凯恩斯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有效需求理论。本文从卡莱斯基出发比较这两位经济学家,探讨他们之间的争论,审视相同和差异之处。关于卡莱斯基和凯恩斯,已有文献中由于视角不同,理解自然不同。卡莱斯基的追随者更强调“卡莱斯基对凯恩斯的批评”,从而凸显出卡莱斯基的优越性,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方面是“凯恩斯对卡莱斯基的批评”,忽视后一方面容易使研究者对卡莱斯基的评价有所偏颇。卡莱斯基和凯恩斯在理论构建、论证方法和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的。对研究者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将卡莱斯基和凯恩斯整合在一起,以使经济理论分析能够有更加完整的图景,这是两位经济学家留给后人的共同智力遗产。

【关键词】卡莱斯基;凯恩斯;后凯恩斯经济学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当大萧条来临时,“两个同样具有原创性的头脑发现了相同的答案”(Robinson, 1977a, p. 7),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和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有效需求理论。但这两位经济学家是如此不同,不仅在理论渊源和论证方法上,而且在意识形态上都有着明显差

^{*} 作者特别感谢辽宁大学李平教授及匿名审稿人的宝贵建议。

^{**} 杨扬,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副教授,E-mail:59052871@qq.com。

引文格式: 杨扬. 2025. 卡莱斯基与凯恩斯:独立找到近乎相同答案的两位经济学家[J]. 政治经济学季刊,4(3):151-175.

Cite this article: YANG Y. 2025. Kalecki and Keynes: Two economists who independently arrived at nearly identical answers[J].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4(3): 151-175. (in Chinese)

异。同时在经济思想史中,凯恩斯和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引发了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而卡莱斯基或多或少被遗忘了。借用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经典评述文章“卡莱斯基与凯恩斯”(Kalecki and Keynes)^①的标题,本文从卡莱斯基出发比较这两位经济学家,探讨他们之间的争论,审视相同和差异之处。

关于卡莱斯基和凯恩斯,已有文献中由于视角不同,理解自然不同。卡莱斯基的追随者更强调“卡莱斯基对凯恩斯的批评”,从而凸显出卡莱斯基的优越性。例如 Sawyer(1985, chapter 9),索耶(Malcolm C. Sawyer)的重点是比较卡莱斯基和凯恩斯的不同方法,“卡莱斯基和凯恩斯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因而他们的方法应该分开展,而不是混为一谈,尽管在某些地方可能有有益的思想交融”(Sawyer, 1985, p. 178)。在引用了罗宾逊夫人、克莱因(Lawrence Klein)等学者对卡莱斯基的评价之后,索耶写道:“卡莱斯基不仅在出版上领先(《通论》),而且发展了一种更好的宏观经济学。”(Sawyer, 1985, p. 180)

诚然,卡莱斯基有其独特贡献,尽管如此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为什么卡莱斯基需要重新评价?为什么他没有得到更广泛的认可?”(Bronfenbrenner, 1976, p. 465)Minsky(2013)指出,卡莱斯基和凯恩斯对经济理论都有其各自的贡献,但也都有各自所忽略的部分。因此,对研究者来说,不能仅强调某一位经济学家的重要性而忽视对其经济思想的反思。《通论》尽管晦涩庞杂但它引发了后续无尽的争论和阐释,而与凯恩斯相比,关于卡莱斯基的研究中所欠缺的重要一点就是批评性讨论。也就是说,研究者不仅需要关注“卡莱斯基对凯恩斯的批评”,还需要看到“凯恩斯对卡莱斯基的批评”,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忽视后一方面容易使研究者对卡莱斯基的评价有所偏颇。

鉴于此,本文不仅将阐述“卡莱斯基对凯恩斯的批评”,还将探讨“凯恩斯对卡莱斯基的批评”,从而完整地评述这两位经济学家之间的关系。全文安排如下:首先阐述这两位经济学家对古典理论的一致反驳,这是他们共同的出发点;随后依次探讨理论层面这两位经济学家在投资决定、收入分配和论证方法上的差异,以及实践层面关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最后是简要结语。

一、对古典理论的一致反驳

罗宾逊夫人在其“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Marx, Marshall and Keynes)^②的

^① 文章最初发表于1964年,后收录在罗宾逊夫人1978年的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Economics*。

^② 罗宾逊夫人1955年在印度德里大学经济学院(Delhi School of Economics)的讲座,收录在1978年的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Economics*。

最后写了如下一段话,“凯恩斯讨论的是发达经济中的失业问题,在这种发达经济中,生产设备已经存在,所缺少的是对潜在生产有利的市场,他设法寻找的是医治困扰富裕国家的疾病的良方”(Robinson, 1978, p. 75),我们相信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卡莱斯基。

在理论层面,卡莱斯基源于马克思(Karl Marx),凯恩斯源于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尽管如此,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不认为古典理论的观点所描述的是一般情况,相反是特例。就这一点而言,两位经济学家无疑都是开创性的^①。凯恩斯无须多言,在《通论》开篇“何谓通论”中他写道:“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通常的情况,古典学派所假设的情况是各种可能的均衡状态中的一个极端之点……古典理论所假设的特殊情况的属性恰恰不能代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社会所含有的属性。”(凯恩斯, [1936] 2009, p. 7)

卡莱斯基看到了相同的问题,只不过他的阐述对象更为具体。1964年,卡莱斯基被授予华沙大学荣誉经济学博士,他做了一个讲座,题为“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Why Economics is Not an Exact Science)。其中,卡莱斯基以“购买力恒定的萨伊定律(Say's law)”为例简要阐述了他对经济学的理解:

萨伊定律断言,所有的收入、工资或利润全部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就消费支出而言,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积累被视为总是用于投资。这一学说明显排除了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总需求总是等于供给。这一定律与物质和能量守恒定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不同之处在于,萨伊定律肯定是错误的。萨伊定律意味着国民收入的价值是不变的。举例来说,如果消费支出减少,投资支出就会增加。但很显然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国民收入的价值会发生突然变化。(Kalecki, 1997, p. 308)

由此在现实层面,当面临“丰裕之中的贫困”这一矛盾现象时,卡莱斯基和

^① 帕西内蒂(Luigi L. Pasinetti)在2007年《凯恩斯和剑桥凯恩斯主义》(*Keynes and the Cambridge Keynesian*)中写道:“(和凯恩斯相比),卡莱斯基是相当不同的,几乎和凯恩斯相同的时间,他(卡莱斯基)是在研究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学时,相当独立地偶然发现了有效需求原理……但他基本上源自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方法,卡莱斯基的情况不能称之为一个智力上的‘革命’。”(Pasinetti, 2007, p. 22n)帕西内蒂着重指出,凯恩斯《通论》改变了传统理论学说的方向,从交换转向生产,这是凯恩斯革命的深远意义,如果就这一点而言,那么很显然卡莱斯基不具有“革命性”。尽管如此,帕西内蒂承认:“这一(马克思)渊源可能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卡莱斯基)被长期低估的原因,相比凯恩斯,不管怎样他(卡莱斯基)总是处在一个次要的位置。”(Pasinetti, 2007, p. 39n)

凯恩斯都指出萧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在凯恩斯看来,“仅仅存在着有效需求的不足便有可能、而且往往会在充分就业到达之前,使就业量的增加终止。”(凯恩斯,[1936]2009,p. 36)卡莱斯基则根本不相信萨伊定律是一定成立的,他认为普遍生产过剩是可能的,大萧条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总需求并不必然等于总供给,资源利用不足的状态恰恰反映了“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力增长和大众购买力之间的矛盾”(Kalecki,1997,p. 309)。

同时,这两位经济学家都清楚地看到了个体经验与宏观整体之间的一致。在凯恩斯是“寡妇的坛子”或是后来更为流传的“蜜蜂的悖论”,而卡莱斯基一针见血地写道:“显然家庭消费越少,储蓄就越高,但个体收入是给定的,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民收入是由消费和投资决定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中任何一个下降都绝不会自动导致另一个上升。”(Kalecki,1997,p. 309)与上述问题直接相联系的是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关系。凯恩斯在《通论》中“煞费苦心”地论证了投资和储蓄相等的命题,而卡莱斯基在国民收入恒等式的基础上简明地指出总投资和总储蓄始终是相等的,“作为一个整体,资本家通过他们的投资和个人消费决定了自己的利润,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Kalecki,1990, pp. 79-80)。

因此,就有效需求而言,卡莱斯基和凯恩斯对古典理论的反驳是一致的。在1936年对凯恩斯《通论》的评述文章中^①,卡莱斯基将《通论》分为两部分,首先是投资水平给定情况下的短期均衡决定(假定生产设备给定),其次是投资数量的决定。卡莱斯基指出:“凯恩斯的理论似乎圆满地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即使一些缄默不言和不准确的阐述可能会引起一些疑问……我对凯恩斯理论的这一部分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思路略有不同,但基本结论是一致的。”(Kalecki, 1990, p. 223)

这里有一点需要进一步阐述,即为什么这两位不同理论渊源的经济学家会得到相同的答案,有效需求不足。就凯恩斯而言,正如他在《通论》中所指出的,他那个时代所学习的李嘉图经济学的问题就在于忽视总需求。“传统经济理论的众所周知的乐观主义……教导人们:只要听其自然,在可能有的最美好的世界中的一切都会走向最美好的途径。我认为,这种状态可以被归之于他们忽视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所造成的对经济繁荣的障碍……古典理论很可能代表我们希望我们的经济制度应该运行的方式,但是,把现实世界假设为这样就等于把

^① 即卡莱斯基1936年发表在波兰经济学期刊 *Ekonomista* 的“凯恩斯理论的评述”(Some Remarks on Keynes's Theory)。由于是用波兰语发表的,这篇评述文章在当时没有产生影响,直到1982年被翻译成英语才被学界知晓,哈考特(Geoff Harcourt)对这篇文章的翻译厥功至伟。而且在哈考特看来,卡莱斯基1936年发表的对《通论》的评述文章“提供了卡莱斯基独立发现有效需求理论的更加毫无疑问的证据”(Harcourt and Kriesler, 2011, p. 155)。

我们的困难假设掉了。”(凯恩斯,[1936]2009, pp. 38-39)由此凯恩斯指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观点是有问题的,总需求可以小于总供给,充分就业不是必然的。尽管凯恩斯在《通论》中将马克思归为“不入流的”,但正如樊弘在其1939年“凯恩斯和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货币和利息理论的比较”中所指出的,凯恩斯与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的批判有诸多相似之处,“无论是凯恩斯的分析,还是马克思的分析,都同样明确地解释了流通领域缺乏计划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樊弘,2018, p. 95)。卡莱斯基探讨有效需求的框架源自马克思扩大再生产,他在马克思、杜冈-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vski)和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基础上始终强调的一点是,扩大再生产绝不是一种“自然”现象,相反“经济可能会陷入一种伴随着周期性波动的简单再生产状态”(Kalecki, 1991, p. 454)。故而卡莱斯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常见状态,这也是他1933年文集中明确假定产能过剩存在的原因。由此可知,尽管理论渊源不同,但在有效需求不足这一点上,卡莱斯基和凯恩斯是殊途同归的。

二、卡莱斯基和凯恩斯关于投资决定的差异

卡莱斯基和凯恩斯都认为萧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但他们都意识到如果投资足够多,那么有效需求问题根本不会存在。在《通论》第三章“有效需求原理”中,凯恩斯写道:“为了维持既定的就业量,就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现期的投资来补偿总产量多出在该就业量时社会所愿意消费的数量部分,因为,除非存在着这一数量的投资,企业家的收入会小于使他们提供这一就业量所应有的数额。”(凯恩斯,[1936]2009, pp. 32-33)卡莱斯基在其1939年文集中评述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框架时谈到了上述问题,但过于简短,相比之下罗宾逊夫人在其《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An Essay on Marxist Economics*)中的阐述更为清晰。“如果资本家不顾利润的前景,老是准备用他们剩余的资本货物进行投资,那么资本货物的产量就会填满消费与最高可能产量之间的缺口,两大部类工业之间的均衡将自行调整,且不管消费水平怎样可怜,不会发生危机。”(罗宾逊,[1947]1962, p. 45)

然而事实肯定不是这样,资本家不会无缘无故地投资。“投资决定于利润率,而利润率归根到底又决定于消费力……(因而)必须提供一种建立在有效需求原理上的利润率论。”(罗宾逊,[1947]1962, p. 45)卡莱斯基和凯恩斯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投资决定理论,这一不同的投资决定理论是两位经济学家之间的主要差异,卡莱斯基1936年对《通论》的评述文章的重点正在于此。简短而言,凯恩斯探讨投资决定的框架是马歇尔的新古典框架,投资诱导(the inducement to invest)

“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表(曲线)与各种期限和风险的贷款利息率结构之间的关系”(凯恩斯,[1936]2009,p. 33),而卡莱斯基则是在动态框架下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的投资决定理论,他关注的是经济周期进程中某一时刻的投资决策。

在“卡莱斯基和凯恩斯”中,罗宾逊夫人指出,卡莱斯基在剑桥出版的1939年文集对凯恩斯《通论》进行了适当补充,首要的一点就是凯恩斯的资本边际效率(marginal efficiency of capital)概念^①。在《通论》第十一章“资本边际效率”中,凯恩斯将资本边际效率定义为一种贴现率,“根据这种贴现率,在资本资产的寿命期间所提供的预期收益的现在值^②能等于该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凯恩斯,[1936]2009,p. 139)。由资本边际效率可以得到投资需求曲线,那么很显然的结论是:“投资量会增加到投资曲线上的一点,在该点,一般的资本边际效率等于现行的市场利息率。”(凯恩斯,[1936]2009,p. 140)

卡莱斯基对凯恩斯投资处理方法的疑问是,当资本家投资时,如果资本边际效率高于市场利率,那么资本家的投资会不会无限大。凯恩斯在《通论》中假定,“随着投资量的增加,该种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就会递减”,他给出了两个原因,一个是“当该种资产的供给量增加时,预期收益会下降”,另一个是“一般说来,该种资产的增加会使制造该种资产的设备受到压力,从而,它的供给价格会得以提高”(凯恩斯,[1936]2009,p. 140),故而投资会达到一个均衡水平。卡莱斯基不认同上述解释,“更高的投资率会提高资本品成本进而降低预期利润率的解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成本增加是实际投资的结果,是事后的,而资本边际效率与事前的投资计划有关”。(Robinson,1978,p. 57)

卡莱斯基提出了他的投资处理方法,首先是区分投资决策和实际投资,两者之间存在时滞,其次是风险递增(increasing risk)的概念。在卡莱斯基的框架下,就某一时刻的资本家投资决策而言,预期利润率和市场利率都是给定的,这意味着个体资本家被动地接受市场状况,由于风险递增存在,资本家的最优投资数量取决于其拥有的和所能获得融资的资本。这样的话,“给定资本家之间的资本分配,在任何时刻所拟定的投资计划总量和预期利润水平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关系”(Robinson,1978,p. 57)。也就是说,在宏观层面,某一时刻资本家阶级的总的投资决策和总利润水平有关,而总利润又取决于此前的投资决策,卡莱斯基正是基于上述关系刻画了资本主义经济动态过程。

罗宾逊夫人指出的第二点是投资变化对未来预期的影响。在明确资本边际效率的概念之后,凯恩斯在《通论》第十二章“长期预期状态”中写道,资本边

^① 罗宾逊夫人指出了三点差异,前两点是关于投资决定的,后一点是关于收入分配的,后者将在下一节探讨。

^② 本文所引《通论》选自高鸿业译本原文。此处的“现在值”即为现值。

际效率“取决于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和它的预期收益……对未来收益的预期部分取决于既存的事实,部分地取决于将来的事件,前者被我们大致当作是肯定的,而后者则只能以或多或少的信心对之进行预测”(凯恩斯,[1936]2009,p. 151)。在凯恩斯看来,“在形成我们的预期时,如果对非常不肯定的事务赋予很大的比重,那将是愚蠢的……出于这一原因,现时存在的事实可以说是不成比例地进入我们长期预期的形成之中”(凯恩斯,[1936]2009,p. 152)。由此凯恩斯认为,影响投资量大小的两个因素即资本边际效率和信心状态,不是全然无关的,信心状态之所以重要其原因就在于它是决定资本边际效率的主要因素之一。

这里的问题在于,当投资增加时,信心状态是否会发生改变。凯恩斯的论述有些模棱两可,“对于信心状态,仅凭理论上的推想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凯恩斯,[1936]2009,p. 153)。罗宾逊夫人指出:“他(凯恩斯)将自己的预期利润曲线视为是独立于实际投资率。”(Robinson, 1978, p. 57)与之相比,卡莱斯基关于信心状态的处理有些简单,在他的经济周期理论框架下更高的投资水平意味着更高的总利润水平,故而更高的预期利润率,这会刺激进一步投资。当然,投资肯定不会是无限制的,尽管投资带来繁荣,但同时会使资本存量增加,这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

综上不难看出,就投资决定而言,卡莱斯基和凯恩斯是完全不同的:卡莱斯基关注的是事前的投资决策行为,而凯恩斯关注的是事后的投资均衡水平。或者可以这样来比较,即卡莱斯基是动态的,凯恩斯是静态的,同时卡莱斯基是非均衡的,凯恩斯是均衡的。López(2002, p. 614)指出:“我们可能赞同或者不赞同卡莱斯基的(投资)周期理论,但我们不应忽视如下事实,即他是第一个针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特征,或者更具体地说针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性特征提出缜密分析框架的经济学家,这一框架不同于一般均衡理论,在(卡莱斯基)这一分析框架下,资本主义的失业问题可以得到一个动态解释。”

卡莱斯基对凯恩斯的投资决定提出了批评,指出了问题所在,并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但需要看到的是,卡莱斯基的解决方法同样是不完美的,他自己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在1968年“马克思再生产方程与现代经济学”(The Marxian Equations of Reproduction and Modern Economics)中,卡莱斯基写道:

事实上,只要我们没有解决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问题,在上述情况下什么会真实发生我们是完全不知道的。马克思没有形成这样一种理论,现代经济学也没能做到这一点。经济学家对周期性波动理论的发展做了一些尝试。尽管如此,涉及长期趋势相关因素的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问题要比“纯经

济周期”(即在长期时受限于简单再生产)的情况复杂得多。我自己沿着这一思路做了一些尝试,我认为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无疑是开创性的。(Kalecki,1991,p.464)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投资的融资问题。正如我们此前文章所指出的(杨扬,2024),卡莱斯基和凯恩斯关于投资融资的思考是异曲同工的,这里不再详述。尽管利率在卡莱斯基的分析中始终处于一个次要的位置,而凯恩斯在《通论》中用了很大篇幅探讨货币和利率,但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位经济学家都认为利率不是由信贷的需求和供给所决定的,融资与储蓄无关,同时他们都指出银行系统提供流动性是至关重要的,信贷扩张对经济复苏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复苏很可能不会实现。

三、卡莱斯基和凯恩斯关于收入分配的差异

谈到卡莱斯基和凯恩斯关于收入分配的差异,就不得不提到剑桥研究项目(Cambridge Research Scheme)。对卡莱斯基来说,剑桥研究项目最开始是雪中送炭,因为他当时正面临失业的窘境(由于政治原因他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华沙研究所的职位,同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即将到期),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不欢而散。

罗宾逊夫人将卡莱斯基介绍给凯恩斯,但凯恩斯对卡莱斯基的最初印象并不深刻。一方面是凯恩斯的身体原因,他当时的状态并不好,另一方面或许是卡莱斯基刚到英国时的英语不是很好。随着卡莱斯基 1937 年“商品税、所得税和资本税的理论”(A Theory of Commodity, Income, and Capital Taxation)、1938 年“布鲁姆实验的教训”(The Lesson of the Blum Experiment)先后发表在凯恩斯主编的 *Economic Journal*,两人之间开始有通信交流。1939 年 1 月 12 日,在给罗宾逊夫人的信中,凯恩斯评价了卡莱斯基在剑桥出版的 1939 年文集:

我一直在读卡莱斯基的书稿。或许是由于你校对的结果,我发现它非常清晰且令人愉悦,而且读起来很容易。我没有对他重新刊印的文章进行比较,不知他修改的程度如何,或许是因为熟悉他的思想,这对我是有帮助的。不管怎样,我觉得新版本简单多了。他在所谓的统计学基础上大胆地、或许是不稳固地简化了他的假设,并由此开始了他的理论(而不是一般化构建理论然后做出简化假设),这一方法非常有趣,如果一个人留意自己的脚步并记得自己在哪里,这是非常有用和有启发性的。他的风格是最独特的——非常有洞察力,非常有美感,在它自己的领域内很完整,尽管我还是忍不住

觉得有些浅显。但这是一本重要的著作,与众不同且具有原创性,给新的研究内容带来了启示。(Marcuzzo and Rosselli, 2013, pp. 188-189)

可以看到,凯恩斯对卡莱斯基 1939 年文集的整体评价是赞誉的,但几个月之后当凯恩斯看到卡莱斯基的剑桥研究成果时,他是持怀疑态度的。在阐述争论之前,简要介绍一下卡莱斯基的剑桥研究。剑桥研究项目的全称是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的剑桥研究计划,其目的是探究 1928 年以来英国经济的变化过程,重点关注不同行业价格与成本之间关系、不同行业就业与产出之间关系、消费和对外贸易以及外国投资与出口之间关系。卡莱斯基是唯一的全职研究人员,两名剑桥学生担任助理工作,裴伯廉(Brian Tew)和徐毓枏(Yu-Nan Hsu)^①。

卡莱斯基按行业收集产出数据,包括煤炭、棉纺、钢铁、烟草、造船和电力供应,以及“主要成本”(劳动力和原材料,prime costs)在行业总产出中的份额^②。托普洛夫斯基(Jan Toporowski)指出,卡莱斯基探究主要成本和竞争的目的在于表明,“标准的马歇尔向上倾斜的平均或边际成本曲线不是生产的特征,相反一个稳定的主要成本(工资和原材料成本)构成了工业价格形成的基础。(Toporowski, 2013, p. 127)”

卡莱斯基在一份总结性的研究中写道:

经济周期中体力劳动占国民收入相对份额的稳定性似乎具有独特的特征,(尽管)这一时间序列在特定行业中没有表现出如此稳定,其变化在每一个行业中都是非常不规律的,但根据六个行业样本计算的时间序列产生了相对的稳定性。从长期来看,体力劳动占国民收入相对份额的稳定显然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事实上,在我们使用的样本中,稳定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这可能让人怀疑在贸易周期的过程中这一稳定是否是一种普遍现象。(Toporowski, 2013, pp. 128-129)

尽管卡莱斯基的语气不是十分肯定的,但上述研究结果实际上佐证了他 1939 年文集第三篇“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Money and Real Wages)的结论,即

^① 徐毓枏(1913—1958),1935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之后留学英国剑桥大学,1940 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执教于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1952 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1958 年去世。《老清华的社会科学》中写道:“他是最早在剑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听过凯恩斯等著名经济学家的课程,他当时还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与左翼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交往密切,他的毕业论文是研究大萧条对英国纺织工业的影响。”(钱颖一和李强,2011)

^② 关于卡莱斯基剑桥研究,参见 Toporowski(2013, chapter 13)以及 Kalecki(1991, pp. 253-255)。

如果收入相对份额是稳定的,那么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之间就没有明显联系,货币工资发生变化但实际工资会保持不变。

最早对卡莱斯基剑桥研究提出批评的不是凯恩斯,而是剑桥的统计学家,例如鲍利(Arthur Bowley)^①、斯通(Richard Stone),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统计方法和数据处理上。然而针对统计方法和数据处理的批评不足以“打败”卡莱斯基,而且卡莱斯基详细地给出了回应,真正让卡莱斯基不能接受的是凯恩斯以及卡恩(Richard Kahn)^②的态度。1939 年 5 月底,凯恩斯在给卡恩的信中写道:

我已经看过了你(卡恩)上学期末从卡莱斯基那里寄来的材料。我承认我很沮丧,对此一点也不感到高兴。我们必须设法弄清楚我们的真实想法。(Toporowski,2013,p.132)

凯恩斯在信中提出了四点疑问,第一点是他不确定卡莱斯基收集统计数据的真实目的,“我(凯恩斯)猜测主要成本和销售收入的比率不是最终目的”。凯恩斯的第二点疑问指向了卡莱斯基收入分配研究的重点,即收入相对份额和产出之间的联系:“如果下一步是将这一(收入相对份额)比率与产出的变化相联系,那么到目前为止,结论似乎是完全混乱的,似乎不存在任何值得困扰的相关性。”后两点都是针对统计方法的。一方面,在凯恩斯看来,如果要探究主要成本和销售收入的比率,那么“最好是询问被选定的企业实际数字是什么,而不是通过背后的侦探工作来得出几乎肯定充满错误的总体数据”;另一方面,行业产出同质性问题的影响,“通过合并行业的两个分支,人们可能得到了任何毫无价值的结果……此外,在这种情况下,统计数据在最大程度上应允许你将它们分开。”凯恩斯总结道:

我看到了非常勤勉的证据,但结果可能是完全缺乏这类研究的天赋。我可能误解了,读得不够仔细,但这是我的第一印象。它给我的印象远不如人们所期望的,举例来说辛格(Hans Singer)^③。(Toporowski,2013,p.133)

由上述疑问不难发现,凯恩斯不熟悉或者说不是很清楚卡莱斯基探讨收入分配的思路,他们之间有两点重要不同。首先,不同的企业定价机制,以及不同

① 鲍利是剑桥研究计划监督委员会的成员。

② 尽管不太为人所知,但卡恩是卡莱斯基剑桥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不仅极力帮助卡莱斯基寻求工作机会,而且也是卡莱斯基剑桥研究的批评者。当然,和罗宾逊夫人一样,卡恩也是卡莱斯基和凯恩斯之间联系的纽带。

③ 这里凯恩斯提到辛格或许是因为,卡莱斯基 1938 年在 *Economic Journal* 发表“布鲁姆实验的教训”之后,辛格对卡莱斯基的文章提出了反驳,这一反驳文章同样发表在 *Economic Journal*。

的边际成本曲线假定。罗宾逊夫人在其 1977 年回忆卡莱斯基的文章中指出,“凯恩斯对于特定商品价格的处理是相当模糊的”,原因在于凯恩斯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这里的传统理论罗宾逊夫人指向了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在竞争情况下,当价格高于主要成本时,各个厂商都将产出扩大到价格和边际成本相等的水平……这一理论要求任何正在开工的厂商都达到其既定设备所具有的生产能力”,但在大萧条时期“几乎所有的厂商都开工不足,价格并没有下降到和主要成本相等的水平”。尽管凯恩斯在《通论》中采用“使用者成本”(user cost)的概念以调和完全竞争同大萧条时期价格高于主要成本这一特征事实之间的不一致,但“凯恩斯的论述没有使它扎根”(Robinson, 1977a, p. 10)。

卡莱斯基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法,他首先将“需求决定的价格”和“成本决定的价格”相区别,其次在“垄断程度”(degree of monopoly)基础上构建了企业微观定价机制。尽管“垄断程度”概念引发了诸多误解和争议,但“卡莱斯基在严格短期意义上提出了他的理论……整个行业的总体垄断程度足以解释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Robinson, 1977a, p. 10)。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卡莱斯基的论证中,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关系,在宏观层面即为产出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不是由需求决定的,而是由“垄断程度”决定的。当然,为得出上述结论,卡莱斯基有两个特别假定,企业在实际生产能力之下运行且单位主要成本(单位产出的原材料和工资成本)在一定产出区间内保持不变。

其次,收入分配和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此前文章所指出的(杨扬, 2023a),卡莱斯基关于分配问题的探讨延续了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方法,不是价格决定收入分配,而是收入分配决定价格。由于不是市场供求决定收入分配,而是企业定价机制决定收入分配,因而收入分配可以独立于宏观整体的产出变化。在卡莱斯基的框架下,决定分配的是垄断程度,决定产出的是有效需求,垄断程度可以独立于产出变化。与之相比,凯恩斯采用的是新古典的均衡分析方法,产出、价格和分配是同时决定的,产出的变化会导致价格和分配同时发生变化。

尽管如此,凯恩斯的疑问不代表他完全否定了卡莱斯基的结论,只不过在他看来卡莱斯基的结论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在 1939 年“实际工资和产出的相对变动”(Relative Movements of Real Wages and Output)中,凯恩斯写道:

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是由卡莱斯基博士在其发表在 *Econometrica* 的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中提出的。卡莱斯基采用一种非常具有原创性的分析方法探讨不完全竞争情况下生产要素的分配问题,这可能成为一项重要的先驱性工作……在我看来,卡莱斯基没有明确解释当实际产出相对

产能的比率发生变化时,为什么相应的不完全竞争程度的变化会如此精准地抵消其他变化。卡莱斯基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产出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在长期会是稳定的,他只是暗示一种因素的变化总是用来抵消另一种因素的变化;但非常令人惊讶的是,总的来说在过去的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垄断程度是不变的。卡莱斯基的解释是基于如下假设,边际实际成本是恒定的,市场不完全竞争程度与产出的变化方向相反,而这一变化刚好被基本原材料价格(系统从外部购买)相对货币工资增加和随产出下降的事实所抵消。然而没有明显的理由表明为什么这些变化会如此接近地相互抵消;似乎更加合理的处理方式是不假定边际实际成本不变,但得出如下结论,即当产出变化时,实际上市场不完全竞争程度的变化足以抵消边际成本变化和原材料价格(系统从外部购买)相对货币工资变化的综合影响。(Keynes, 1939, p. 49)

很明显,邓洛普先生、塔西斯先生和卡莱斯基博士给了我们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而且严重动摇了短期分配理论迄今为止所依据的基本假设……与此同时我感到欣慰的是,他们的结论倾向于证实这样一种观点,即短期波动的原因在于劳动需求的变化,而不是实际劳动供给价格的变化。(Keynes, 1939, p. 50)

在卡恩和他探讨了上述凯恩斯提出的疑问之后(凯恩斯给卡恩的信),卡莱斯基的反应是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①,但平心而论这一反应有些不必要。归根结底,凯恩斯表明的是,相对稳定的收入相对份额是一个长期现象,需要一个长期解释,而垄断程度和原材料价格的变化是短期的,垄断程度和原材料价格的变化相互抵消不足以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卡莱斯基试图用一个短期框架解释一个长期问题,他的论证过于简化,这是他剑桥研究招致批评的真正原因。

实际上,卡恩在探讨中已经指明了上述问题,但显然卡莱斯基没有认识到,他的回应始终集中在统计方法和数据处理上,这无疑只会让双方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卡莱斯基没有探讨收入分配与产出变化之间的联系,因为在他的理论框架下这是由不同因素决定的,故而可以简化处理。凯恩斯、卡恩很难接受

^① 在1939年6月9日写给卡恩的一封信中,卡莱斯基写道:“在仔细考虑了您昨天告诉我的事情之后,我得出了明确结论,即我不应该留在剑桥继续下一年了……我不能冒这两年被认为是浪费的风险……完全的……我只是认为在研究结果不令人满意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得出结论……今年剩下的时间里,我应致力于整理已完成的研究,并对结果进行理论解释。”(Toporowski, 2013, p. 133)

这样的处理方法,他们认为卡莱斯基需要解决一般性的问题。卡恩在给卡莱斯基的信中写道:“我猜想在每个行业中以吨为单位来表明实际价格和主要成本如何变化会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或许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凯恩斯在他3月份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即区别工资变化的影响和产出变化的影响。”(Toporowski, 2013, p. 133)

四、卡莱斯基和凯恩斯关于论证方法的差异

本节的主题在杨扬(2023a)中已有所讨论,而且前一节关于收入分配的争论也体现了卡莱斯基和凯恩斯在论证方法上的不同,这里将阐述进一步丰富。

卡莱斯基曾多次向凯恩斯主编的 *Economic Journal* 投稿,两人就投稿文章有很多通信讨论。在这些通信讨论中,最早是关于卡莱斯基1937年“商品税、收入税和资本税的理论”。虽然文章的主题是税收,但卡莱斯基和凯恩斯在通信中讨论了工资变化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正如我们此前文章中所指出的,卡莱斯基和凯恩斯之间争论的焦点是前提假设。卡莱斯基假定税收的引入不会改变资本家的行为选择,当问题转换为探讨工资变化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时,他同样假定工资的变化不会改变资本家的行为选择,凯恩斯对这一假定提出了疑问。凯恩斯尽管认可卡莱斯基1937年文章的结论,但在他看来卡莱斯基为了技术上的方便所采用的某些特定假设可能是不必要的,放松这些假设并不会影响主要结论。

这两位经济学家之间更为激烈的争论是关于卡莱斯基1941年“技术进步理论”(Theorem on Technical Progress),只不过这一次不是直接交锋,而是罗宾逊夫人充当了卡莱斯基的代言人。在1941年文章中,卡莱斯基延续了他1939年文集中对新古典均衡分析方法的批评,这一均衡方法假定资本设备存量不发生变化,而在卡莱斯基的经济周期理论框架下,投资通常不会保持在稳定水平,资本设备存量会发生变化,因而均衡状态不会是永久的^①。卡莱斯基将技术进步视为一个过程,而不是生产参数的离散变化,同时“这一过程的连续本质意味着长期均衡无法实现,因为在过程的任何给定阶段,被认为是可能即将到来的任何均衡将随着过程进入下一个阶段而消失”(Toporowski, 2018, p. 64)。卡莱斯基将技术进步定义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他认为技术进步还会改变最大产能与资本数量的比率,增加寡头垄断程度(因为产业集中),往往会降低一般价格水平,以及鼓励投资。卡莱斯基比较了两个体系,一个是技术进步的纯

^① 在动态框架下,这一点与卡莱斯基对凯恩斯投资决定的批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技术”后果的影响,即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与产能比率的纯“技术”效应,他称之为“参考”体系(reference system),另一个体现了技术进步的制度化后果的影响,即技术进步导致寡头垄断程度、一般价格水平和投资引诱的变化,他称之为“现实”体系(actual system)。由此可知,卡莱斯基 1941 年文章的目的是比较技术进步不同影响路径的结果。

在看到投稿给 *Economic Journal* 的 1941 年文章早期版本之后,凯恩斯写信给罗宾逊夫人征求其意见(1941 年 2 月 4 日),他写道:

正如我此前所说的,在几页高度理性的介绍之后,我的第一印象是它变得很高深,几乎是疯狂的无稽之谈。我愿意相信,就某些假设而言,他(卡莱斯基)的结论是正确的。但在在我看来,其中很多假定是潜在的和隐含的,以至于没有人可以说他(卡莱斯基)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事实上,我不能完全确定这些假设是否是自相矛盾的。在处理“长期问题”时,一开始就假定所有企业都在产能之下运行,这不是很奇怪吗?(Keynes,1983,p. 829)

显而易见的是,凯恩斯不熟悉卡莱斯基的论证思路,如果他看过卡莱斯基 1934 年“三种体系”(Three Systems)^①的话,或许就不会这样评价了,因为卡莱斯基 1941 年文章和 1934 年文章的论证思路是完全相同的。凯恩斯认为,卡莱斯基的结论是技术进步导致产出下降,但这样的结论在直觉上让人很难理解。“如果由于技术进步,以前长一片草的地方现在长出了两片草,但产出却没有增加……他(卡莱斯基)没有给出产出的定义……整个方法没有达到荒谬的地步吗?”(Keynes,1983,p. 829)

罗宾逊夫人在回信中为卡莱斯基进行辩护,她首先明确指出了卡莱斯基文章的目的,即卡莱斯基尝试将《通论》扩展到短期之外。罗宾逊夫人进一步指出,卡莱斯基论证的关键在于假定两个体系中的有效需求是相同的,“那么产出是相同的,通过增加人均产出,发明创造减少了就业(相对参考体系)”(Keynes,1983,p. 830)。在罗宾逊夫人看来,卡莱斯基表明的是当发明创造导致资本相对劳动的份额增加时,节俭会增加,这是产出(相对参考体系)下降的原因。“原来长一片草的地方长出了两片草,但对于干草的需求下降了。”(Keynes,1983,p. 830)此外,罗宾逊夫人解释说,企业在最大产能之下运行以及价格普遍超过边际成本,这是源于不完全竞争理论。尽管如此,罗宾逊夫人承认:“卡莱斯基愚

① 这篇文章发表在波兰经济学期刊 *Ekonomista*, 详细介绍参见 Toporowski(2013, pp. 69-71)。

蠢的地方是坚持用这种不近人情的风格写文章,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罪恶的傲慢(a kind of sinful pride)。”(Keynes,1983,p. 830)

在2月12日给罗宾逊夫人的回信中,在表达了对不完全竞争理论是否足以解释“企业在长期会在最大产能之下运行”的困惑之后,凯恩斯谈到了卡莱斯基“罪恶的傲慢”:

我认为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行为,尽管可能是性格上的和审美上的,而不是智力上的。不管怎样,他(卡莱斯基)必须以这样一种风格来写文章,即从表面上看是相当清楚的,无论他是不是在胡说八道。我毫不怀疑他有所指。但我猜测他在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故技重施,即采用与现实或任何其他情况都不可能有联系的人为假设,这些假设只是碰巧导致了一个想要的结果。(Keynes,1983,p. 831)

在2月18日给罗宾逊夫人的回信中,凯恩斯进一步指出:

卡莱斯基必须准确地告诉我他在模型中假设了什么,它与现实世界究竟有什么不同;尤其是,为了他最终比较的目的,他必须对假定做出解释,即他所探讨的两种状况的假设之间不存在不一致性,这样从一种状况到另一种状况才是合理的。深奥的错误在于,在隐含知识、背景和假设的整体精心设计下的写作对期刊之外的大多数读者而言是完全未知的。(Keynes,1983,p. 832)

尽管罗宾逊夫人在2月24日的回信中强调“卡莱斯基是在解释谜团,而不是创造谜团”(Keynes,1983,p. 833),但凯恩斯依然未能信服,他转而征求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的看法。在给卡尔多的信中,凯恩斯提出了两点疑问:首先,凯恩斯认为,卡莱斯基参考体系的方法是危险的,“(卡莱斯基的方法)做了未经证实的假设,在没有考虑任何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将一个因素叠加在另一个因素之上”;其次,凯恩斯认为“(卡莱斯基)所得出的结论似乎从一开始就是显而易见的”(Keynes,1983,p. 834)。

这里先谈第二点疑问。卡尔多在回信中赞同凯恩斯的判断,他认为卡莱斯基1941年文章的结论在《通论》中是隐含着的,而且在罗宾逊夫人《长期就业理论》(*The Long Period Theory of Employment*)中已经充分探讨,这或许是凯恩斯认为“显而易见”的原因。罗宾逊夫人对此提出了不同观点(3月6日给凯恩斯的信),她承认卡莱斯基的论证有些简化,“但它(卡莱斯基的文章)是对变化中的经济进行分析的一个勇敢尝试,不使用短期或长期假定,(因为)这两种

假定都是不充分的”(Keynes, 1983, p. 834)。罗宾逊夫人认为,卡莱斯基文章的贡献就在于避免了分析上不必要的困难。“如果没有这一理论,人们会认为必须考虑技术进步对节俭等的影响,正如我在《长期就业理论》中所做的,卡莱斯基正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是必要的一步。”(Keynes, 1983, p. 835)

第一点疑问和前文关于卡莱斯基 1937 年文章的争论是一致的。正如我们在杨扬(2023a)中所指出的,凯恩斯对卡莱斯基的批评延续了他自己在《通论》中的观点。在《通论》第 21 章“价格论”中,凯恩斯写道,“在我们把使问题复杂化的因素——分离出来并且得出暂时性的结论以后,我们还要回过头来尽量顾及到各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这就是经济学思维的性质”,因而“用虚假的数学方法把一个经济分析的体系加以公式化和形式化并假设所牵涉到的各种因素之间全然相互独立,这种做法的最大的弊端在于一旦各种因素之间全然相互独立的假设条件不能成立,那么它就会失去其说服力和权威性”,因为“这些部分的不精确的程度正和它们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是一样的”,结果是“假设条件使那些作者们能在矫揉做作和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忘掉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的性质”(凯恩斯, [1936]2009, p. 309)。与之相比,“卡莱斯基的每一个模型都或多或少基于极端的简化,刚好适合手头的状况,当应用于不同状况时,可能会完全导致歧途”(Steindl, 1990, p. 305)。

由此可知,尽管卡莱斯基的有效需求理论,特别是他的 1939 年文集与凯恩斯在《通论》中想表达的基本上殊途同归,但从理论的严谨性来看,卡莱斯基在某些方面是有所欠缺的,他的一些简化处理过于强调某种特定情况。即便卡莱斯基可以利用统计数据支撑自己的观点,例如他的剑桥研究,但肯定无法令人完全信服。卡莱斯基如此简化处理的原因在于他的经济学教育是自学成才(而且是工科出身),他没有受到过新古典理论的熏陶,相反源自欧洲大陆传统,他的理论更关注现实问题,他采用了古典经济学的论证方法。而凯恩斯在《通论》中反驳的恰恰是古典经济学的论证方法,他清楚地知道经济学中有些命题不是永远起作用的,有些命题只有在以一种经济活动代替另一种经济活动的条件下才发挥作用,故而他特别强调前提假设的重要性。“(正统经济学说的)错误不在于它的被精心树立起来的在逻辑上前后一致的上层建筑,而在于它的假设前提缺乏明确性和一般性。”(凯恩斯, [1936]2009, 序言)

卡莱斯基 1941 年“技术进步理论”被凯恩斯拒绝了,但他 1942 年“利润理论”(The Theory of Profits)被凯恩斯接受了,当然两人之间的通信讨论仍在继续着。凯恩斯依然强调前提假设的问题,而卡莱斯基的回应重在阐明他的假设是现实的,是有依据的。就像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油和醋不会混合在一起”(Robinson, 1977a, p. 9),这两位经济学家似乎走在平行的轨道上,互相看着对

方,清楚对方的目的何在,但都非常地固执己见,不愿意轻易妥协。

顺便指出一点,关于卡莱斯基和凯恩斯之间的通信讨论,一些卡莱斯基追随者的观点是有所偏向的。费维尔(George R. Feiwel)认为,“卡莱斯基在信件中的口吻是恭敬的,凯恩斯的口吻通常是批评的,有时是严厉的,但卡莱斯基对批评的回应强烈地捍卫了自己的观点”(Feiwel, 1989, p. 54)。洛佩斯(Julio López G.)和阿祖兹(Michaël Assous)写道,“凯恩斯对卡莱斯基的态度是复杂的……但有时候,他对卡莱斯基非常挑剔,甚至很尖刻”(López and Assous, 2010, p. 9)。如果从主编和投稿者的角度来看,这些追随者的观点可以接受,但不应过分强调。实际上,卡莱斯基和凯恩斯都非常自负,在通信讨论中他们都是比较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尽管如此凯恩斯没有滥用他的主编权力。阿西马科普洛斯(Athanasios Asimakopulos)在其1990年评述文章的最后写道:“凯恩斯有时未能立即理解卡莱斯基所要表达的,他们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回应(彼此的)建议,但凯恩斯通常是赞同的,而且他的很多建议有助于改进卡莱斯基寄给他的文章,当卡莱斯基决定不再进一步修改时,凯恩斯按照原样发表了这些文章。”(Asimakopulos, 1990, p. 62)

五、卡莱斯基和凯恩斯关于意识形态的差异

费维尔在其1975年著作中比较了卡莱斯基和凯恩斯的诸多不同,包括生活背景、社会地位、教育、经历、政治态度,以及性格和气质(Feiwel, 1975, chapter 2)^①。研究者之所以关注这些方面的不同,并不是着眼于理论层面的考量,相反是实践层面这两位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艾沙(Eprime Eshag)指出:“卡莱斯基和凯恩斯之间更加重要的差异应从他们著作中所包含的实践层面的政治信息中寻找,而不是从他们的理论模型中寻找。”(Eshag, 1977, p. 79)

就背景而言,凯恩斯出生于英国上层阶级家庭,其父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ohn Neville Keynes)是剑桥大学教授,他的早年生活是舒服惬意的。卡莱斯基则不然,尽管幼年时家境较好,但随着其父生意衰败,以及波兰在20世纪初爆发的动乱,再加上犹太人身份,这些都使得卡莱斯基的早年生活可以用“困难重重”来形容。由此可知,对经济萧条的深刻感受,卡莱斯基要比凯恩斯强烈得多。

就教育而言,凯恩斯接受的是大英帝国最好的教育,而卡莱斯基中途辍学。尽管如此,正如很多研究者所指出的,至少就经济学而言,卡莱斯基是有优势的,因为他无须像凯恩斯那样摆脱传统的桎梏,正统经济理论对他来说是根本

^① 此外,很多学者关于卡莱斯基的回忆文章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卡莱斯基和凯恩斯之间的比较,例如Steindl(1981)等。

不存在的,他的理论起点是马克思、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卢森堡,尤其是卢森堡。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未受到过正统经济理论的熏陶,卡莱斯基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之间是“相互不理解的”,他也不接受新古典的均衡分析方法。

卡莱斯基和凯恩斯的经历和社会地位更是大相径庭。凯恩斯大学毕业之后先是公务员,然后回到剑桥大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他已经是一位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1936 年《通论》的出版更是使他声名大作,尽管这一经典著作始终伴随着争议。卡莱斯基的起步是艰辛的,直到 1929 年底他被华沙研究所聘用才开始经济学职业生涯,此时他已经 30 岁了。尽管在剑桥和牛津卡莱斯基获得了一些学术认可,但也仅限于此。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卡莱斯基来自动荡的波兰,英国不是他的祖国,作为一个流亡公民,不稳定因素始终伴随着他。费维尔的评述是,“卡莱斯基缺少社会地位、权威和影响力”(Feiwel,1975,p. 49)。

或许正是上述差异造就了卡莱斯基和凯恩斯不同的政治态度。如很多研究者所指出的,凯恩斯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对资本主义的态度绝不是摧毁,相反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现实存在的问题,他希望能够有所改善。卡莱斯基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是模糊的,尽管他被认为是激进的,但这一激进是相对凯恩斯而言的。如果相对的是马克思,那么卡莱斯基很难会被认为是激进的。费维尔认为,卡莱斯基的政治态度随着社会发展有一些转变,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二战、再到战后资本主义(Feiwel,1975,p. 51)。这一观点很难说正确与否,因为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卡莱斯基始终是非常理性地看待它们,与其说他赞成或反对某一种社会制度,莫不如说他更希望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与凯恩斯相比,卡莱斯基是一个更为“严肃的”(serious)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的评述如下:

卡莱斯基和凯恩斯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是巨大的……凯恩斯觉得他是在通过证明失业是可以克服的来拯救资本主义。卡莱斯基曾经生活在准法西斯主义波兰的贫穷和偏见中,他对弱者的同情是强烈且亲密的,他看待问题的视角是减轻失业工人痛苦,而不是改进货币经济运行。(Robinson,1977b,p. 68)

艾沙总结了卡莱斯基和凯恩斯在政策层面的三点不同(Eshag,1977),分别是政府干预的目的和范围、收入分配、思想和既得利益的相对重要性。前两点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就政府干预的目的而言,卡莱斯基和凯恩斯是相同的,即填补有效需求的缺口,但就政府干预的范围而言,特别是收入分配,这两位经济学家之间是有差异的,凯恩斯相对保守,卡莱斯基相对激进。

凯恩斯的首要目的是挽救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体系,避免失业对经济的冲击,故而他将政府干预限定在确保充分就业但同时将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留给市场力量。在《通论》最后一章,凯恩斯写道:“保证充分就业所必需的中央控制

当然会大为扩充传统的政府职能……尽管如此,仍然会留下广阔的天地使私人 在其中运用他们的动力和职能,在这个天地中,传统的个人主义的有利之处仍然会继续存在。”凯恩斯承认,“由于使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相互协调而引起的政府职能的扩大是对个人主义的严重侵犯”,尽管如此他依然认为,“它不但是避免现在的经济制度完全被摧毁的唯一可行之道,而且也是个人动力能成功地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凯恩斯,[1936]2009,p. 394)。简言之,凯恩斯相信,“通过对问题的正确分析,也有可能把疾病治愈,而与此同时,又保存了效率与自由”(凯恩斯,[1936]2009,p. 394)。

卡莱斯基对挽救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体系没有特殊兴趣,在他看来无论是投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还是消费,其目的都是填补有效需求的缺口,只不过他认为当投资达到一定限度之后,此后的支出应集中在补贴消费,因为这会更有效地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在1944年“实现充分就业的三种路径”(Three Ways to Full Employment)中,卡莱斯基谈到了公共投资和补贴消费之间的比较,他认为有效需求的缺口可能会很大,“以至于公共投资很快将完全无用,或者至少几乎无用”,此时将支出计划限制在公共投资是荒谬的,由此他提出了一个“社会优先事项”原则。简言之,即在给定时期是为孩子提供更多的泳池还是更多的牛奶,卡莱斯基意识到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影响,但不管怎样“社会优先原则都不应仅仅是为了提供就业的目的而在一段河段上建造五座桥梁”(Kalecki, 1990, p. 368)。

由此可以看到两位经济学家对收入分配的不同理解。凯恩斯意识到了收入分配问题,但他不希望过多干预。“我(凯恩斯)相信,存在着社会上的和心理上的理由来认为:相当大的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是合理的,但不平等的程度应该比目前存在的差距为小。”(凯恩斯,[1936]2009,p. 387)而卡莱斯基着眼于收入分配对低收入人群消费的影响,他更偏好通过收入分配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这是他与凯恩斯之间的重要不同,最明显体现在他们关于配给问题的不同看法,参见杨扬(2023b)。而且在卡莱斯基的框架下,是资本家而非工人具有改变收入分配的权力,由此可知他强调收入分配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即使可以通过投资填补有效需求的缺口,但可能无助于提高工人生活水平。

同时,尽管这两位经济学家都强调有效需求,但与凯恩斯相比,卡莱斯基忽视了供给侧的影响。凯恩斯在《通论》中写道:“改变人类本性的任务决不能混同于管理人类本性的任务……只要一般的人,甚至社会中相当多的一些人仍强烈地沉湎于赚钱的癖好,那么,稳健的政治家就应该让游戏在规则和限度的约束下继续进行下去。”(凯恩斯,[1936]2009,p. 388)凯恩斯的言下之意是,自由竞争体系同样是必要的,他和他的老师马歇尔一样相信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他所希望的是“必要的社会化的步骤可以逐渐采用,从而不会割断社会的一般传统”(凯恩斯,[1936]2009,p. 392)。与之相比,在卡莱斯基的分析中,与供给侧相关的企业家精神、竞争、对抗、熊比特的“创造性破坏”以及市场机制、对产权的充分考量,这些因素都不存在(Brus,1999,p. 260)。

就第三点思想和既得利益的相对重要性而言,艾沙指出:“尽管具有坚定务实精神和聪明才智,但作为一个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凯恩斯倾向于夸大经济思想进步在塑造经济政策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卡莱斯基认识到思想在影响经济政策和事件进程方面的局限性。”(Eshag,1977,p. 81)上述观点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凯恩斯《通论》的结束语和卡莱斯基1943年的经典文章“充分就业的政治方面”(Political Aspects of Full Employment)。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艾沙的观点,某种程度上他低估了凯恩斯,至少就思想而言,这两位经济学家是非常相近的,他们都认识到思想无与伦比的价值。

1964年,为庆祝他65岁生日,卡莱斯基在当时任教的波兰中央计划统计学院做了一次非正式演讲,谈到了自己在为政府建言献策中所经历的挫折。卡莱斯基承认,在他的建议和他曾提供建议的政府的政策之间很难识别出任何的正相关性,但他依然认为是值得的。在演讲的最后,卡莱斯基指出,经济学家的努力不会是徒劳无功的,甚至有一天会对大众有益,他希望后辈学者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他们自己的想法获得认可。这直接让人想到凯恩斯在《通论》最后所写,“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凯恩斯,[1936]2009,p. 396)。

就既得利益而言,这两位经济学家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凯恩斯是乐观的、相对理想的,而卡莱斯基是悲观的、相对现实的^①。凯恩斯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但同时他清楚地知道,“这不是就立即产生的影响而言,而是指一段时期之后”,由此他写下了《通论》的结束语,“不论早晚、无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凯恩斯,[1936]2009,p. 397)。凯恩斯绝不是没有意识到既得利益的影响,只不过他一如既往地含糊其词,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卡莱斯基由于自己的生活经历,他性格中的悲观特质^②,以及他的经济学家抱负,一方面他指出政府应如何做才能实现和保持

① 由于其现实性,卡莱斯基1943年关于政治因素的文章无疑更加容易引起研究者的共鸣。例如,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其《现在终结萧条!》(*End This Depression Now*)中援引了卡莱斯基1943年文章之后写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觉得它很极端,但是现在看起来它似乎合情合理。”(克鲁格曼,[2012]2012,p. 96)

② 利平斯基(Edward Lipiński)在其回忆文章中指出:“对经济生活的现实观察使卡莱斯基形成了一种明显的过敏症……他不喜欢丰收,因为丰收会使计划者兴高采烈,如果这一喜悦出现在长期决策制定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Lipiński,1977,p. 75)

充分就业,另一方面他又预见性地写道,“认为政府只需要知道如何做就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维持充分就业的观点是错误的”(Kalecki,1990,p.347),这是卡莱斯基不同于凯恩斯之处。塞巴斯蒂安(Mario Sebastiani)在评述这两位经济学家关于失业的长期视角时写道:“当然,在相似之处的背后存在着不同的哲学思想,更深层次的是,一位经济学家坚信思想进步超越既得利益,而另一位经济学家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之截然相反,所有这些有时会导致他们所表现出的态度分别更倾向于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而不是具有充分依据的论证。”(Sebastiani,1989,p.93)

六、简要结语

关于卡莱斯基和凯恩斯,卡莱斯基的追随者大多都会引用罗宾逊夫人的经典评述,“卡莱斯基的论述在某些方面是比凯恩斯的《通论》更为真正的‘通’论”(Robinson,1972,p.4),其目的是彰显卡莱斯基的独特重要贡献。但这些追随者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罗宾逊夫人评述中的限定,“在某些方面”(in some ways),这使得他们对卡莱斯基的评价总是显得有一点极端。当然,这不难理解,因为与凯恩斯相比,卡莱斯基过于默默无闻,而且现代主流经济学沿用了新古典的均衡分析方法,源自马克思的卡莱斯基很自然地被归为非主流了。

以陈英(1993)为例。在评述了卡莱斯基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之后,陈英写道,“卡莱斯基的体系实质上是对‘凯恩斯革命’的‘革命’”^①,并指出了卡莱斯基的三点理论贡献,即“不完全竞争革命”放弃了“自由竞争”这一理论上的假设前提,“微观理论革命”抛弃了“边际成本递增”的结论并使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融为一体,实现了宏观分析的真正动态化和完整化(陈英,1993,p.38)。

诚恳来说,“凯恩斯革命”的“革命”有些夸大。卡莱斯基和凯恩斯的理论框架和目标是不同的,以任何一方为基准来审视另外一方都不是很恰当的。不管是凯恩斯还是卡莱斯基,他们都是对当时正统经济理论学说的革命,只不过凯恩斯的革命并不彻底,而当时的正统理论学说对卡莱斯基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故而卡莱斯基更具“革命性”。而且就上述三点理论贡献而言,一方面我们承认,需要看到卡莱斯基的独特贡献,他对凯恩斯《通论》的批评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法,但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卡莱斯基解决方法的局限性,这明显体现在凯恩斯对他的批评之中。套用罗宾逊夫人《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经典评述:“卡莱斯基(马克思)的分析太简单,而凯恩斯(正统派)的学说又说得过于天花

^① 李帮喜和夏锦清(2019,p.97)写道:“但相比凯恩斯的思想,卡莱斯基更具‘革命性’。”两位作者是比较谨慎的,他们给革命性加上了引号。

乱坠了。”(罗宾逊,[1947]1962,p. 49)

凯恩斯希望从一般化的理论视角审视大萧条,他《通论》想表达的内容有些庞杂,而卡莱斯基集中在投资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有效需求是隐含其中的,某种程度上他有意地简化了论证。尽管如此,这两位经济学家之间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都认为“至少在宏观经济意义上,经济系统会受到严重的、致命的、明显的市场失灵的影响,(而且)这一影响可以通过不同的政策组合来修复”(Feiwel,1989,p. 74)。由此来看,虽然卡莱斯基的论证方法和政策结论与凯恩斯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的”(Kriesler,2002,p. 629),这是罗宾逊夫人“在某些方面”的真正含义。因此,对研究者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将卡莱斯基和凯恩斯整合在一起,以使经济理论分析能够有更加完整的图景,这是两位经济学家留给后人的共同智力遗产。

参考文献

- 陈英. 1993. 卡莱斯基与凯恩斯论有效需求[J]. 南开经济研究, (5): 34-39.
CHEN Y. 1993. Kalecki and Keynes on effective demand [J]. *Nankai Economic Studies*, (5): 34-39. (in Chinese)
- 樊弘. 2018. 凯恩斯和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货币和利息理论的比较[J]. 政治经济学报, 12(2): 91-105.
FAN H. 2018. Keynes and Marx on the theory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money and interest[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2): 91-105. (in Chinese)
- 凯恩斯. 2009.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重译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original language) KEYNES J M. 1936.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M]. London: Macmillan.
- 克鲁格曼. 2012. 现在终结萧条! [M]. 罗康琳,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original language) KRUGMAN P. 2012. *End this depression now!*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李帮喜, 夏锦清. 2019. 新卡莱茨基经济学研究新进展[J]. 经济学动态, (11): 97-111.
LI B X, XIA J Q. 2019. New research progress on Neo-Kaleckian economics [J].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 97-111. (in Chinese)
- 钱颖一, 李强. 2011. 老清华的社会科学[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QIAN Y Y, LI Q. 2011. *Old Tsinghua social sciences*[M].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琼·罗宾逊. 1962.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original language) ROBINSON J. 1947. *An essay on Marxism economics* [M]. London: Macmillan Co. Ltd.
- 杨扬. 2023a. 卡莱斯基：一个“孤立”的经济学家——托普洛夫斯基的两卷本“卡莱斯基传”评述[J]. 政治经济学季刊, 2(3): 143-166.
- YANG Y. 2023a. Michal Kalecki: An “isolated” economist—Review of the two-volume biography of Michal Kalecki by Jan Toporowski [J].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2(3): 143-166. (in Chinese)
- 杨扬. 2023b. 卡莱斯基的支出配给评述[J]. 经济思想史研究, (1): 81-96.
- YANG Y. 2023b. Review of Kalecki's expenditure rationing [J]. *Research on Economic Thought*, (1): 81-96. (in Chinese)
- 杨扬. 2024. 投资、储蓄和融资再审视——20 世纪 80 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者之间争论的评述[J]. 政治经济学季刊, 3(2): 127-150.
- YANG Y. 2024. Reassessment of investment, saving and finance—A review of the debate among Post-Keynesian economists in the 1980s [J].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3(2): 127-150. (in Chinese)
- ASIMAKOPOULOS A. 1990. Kalecki and Keynes: Their correspondence [J].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2(1): 49-63.
- BRONFENBRENNER M. 1976. Review of the intellectual capital of Michal Kalecki, A study in economic theory and policy by G. R. Feiwel, L. R. Klein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6(2): 464-466.
- BRUS W. 1999. Great debt and a few grievances: A note on Michal Kalecki as my adopted mentor [J].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1(3): 257-260.
- ESHAG É. 1977. Kalecki's political economy: A comparison with Keynes [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1): 79-85.
- FEIWEL G R. 1975. *The intellectual capital of Michał Kalecki: A study in economic theory and policy* [M].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 FEIWEL G R. 1989. The legacies of Kalecki and Keynes [M]//SEBASTIANI M. *Kalecki's Relevance Toda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45-80.
- HARCOURT G, KRIESLER P. 2011. The influence of Michał Kalecki on Joan Robinson's approach to economics [M]//ARESTIS P. *Microeconomics, macro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Essays in honour of Malcolm Sawy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53-169.
- KALECKI M. 1990. *Collected works of Michal Kalecki. Vol. I, Capitalism: Business Cycles and Full Employment* [M]. OSIATYNSKI J,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KALECKI M. 1991. *Collected works of Michal Kalecki. Vol. II, Capitalism: Business Cycles and Full Employment* [M]. OSIATYNSKI J, ed.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 KALECKI M. 1997. *Collected works of Michal Kalecki Volume VII, Studies in Applied Economics 1940—1967 Miscellanea* [M]. OSIATYNSKI J,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KEYNES J M. 1939. Relative movements of real wages and output [J]. *The Economic Journal*, 49(193): 34-51.
- KEYNES J M. 1983.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ume 12: Economic articles and correspondence: investment and editorial*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RIESLER P. 2002. Was Kalecki an “imperfecionist”? Davidson on Kalecki [J].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24(4): 623-629.
- LIPÍŃSKI E. 1977. Michal Kalecki [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1): 69-77.
- LÓPEZ G J. 2002. Two versions of the principle of effective demand: Kalecki and Keynes [J].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24(4): 609-621.
- LÓPEZ G J, ASSOUS M. 2010. *Michal Kalecki*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MARCUZZO M C, ROSSELLI A. 2013. *Economists in Cambridge: A study through their correspondence, 1907—1946* [M]. London: Routledge.
- MINSKY H P. 2013. The relevance of Kalecki: The useable contribution [J]. *PSL Quarterly Review*, 67(265): 95-106.
- PASINETTI L L. 2007. *Keynes and the Cambridge Keynesians: A ‘revolution in economics’ to be accomplishe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BINSON J. 1972. The second crisis of economic theory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1/2): 1-10.
- ROBINSON J. 1977a. Michal Kalecki on the economics of capitalism [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1): 7-17.
- ROBINSON J. 1977b. Portrait: Michal Kalecki [J]. *Challenge*, 20(5): 67-69.
- ROBINSON J. 1978.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economics* [M]. London: Academic Press.
- SAWYER M C. 1985. *Economics of Michal Kalecki*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SEBASTIANI M. 1989. Long-period perspectives on unemployment in Kalecki and in Keynes [M]//SEBASTIANI M. *Kalecki’s Relevance Toda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81-97.
- STEINDL J. 1981. A personal portrait of Michal Kalecki [J].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3(4): 590-596.

- STEINDL J. 1990. *Economic papers 1941—88*[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TOPOROWSKI J. 2013. *Michał Kalecki: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volume 1 rendezvous in Cambridge 1899—1939*[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TOPOROWSKI J. 2018. *Michał Kalecki: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volume II: by intellect alone 1939—1970*[M].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Kalecki and Keynes: Two Economists Who Independently Arrived at Nearly Identical Answers

YANG Yang

(Liaoning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 CPC, Shenyang,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30s, when the Great Depression hit, Michal Kalecki and John Maynard Keynes respectively put forward their own theories of effective demand.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Michal Kalecki to compare the two economists, explore their disputes, and examin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Regarding Kalecki and Keynes, due to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understanding is naturally different. Kalecki's followers emphasize more on "Kalecki's criticism of Keynes", thereby highlighting Kalecki's superiority. However, this is only one side of the coin; the other side is "Keynes' criticism of Kalecki". Ignoring the latter aspect may lead researchers to have a biased evaluation of Kalecki. Kalecki and Keynes have differences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rgumentation methods, and ideology. Nevertheless, their relationship should be complementary rather than competitive. For researchers, what is truly important is how to integrate Kalecki and Keynes to enable economic theory analysis to have a more complete picture. This is the common intellectual legacy left by the two economists to future generations.

Keywords: Michal Kalecki; John Maynard Keynes;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